

隨筆·觀察

# 中國結：新世紀的國家圖騰

● 張 閱

如同黃昏的蝙蝠，無數中國結在新世紀中國的上空飄蕩，在它紅色翼翅的卵翼下，官民商學兵團結一致，親密無間。這是一個好兆頭！它預示了一個世紀的太平氣象。

一件普通的民間工藝品，在一夜之間飛黃騰達，成為整個國家的象徵物，聽上去像是一個童話。正如中世紀阿拉伯傳說中所說的那樣：一天，哈里發遇見了快樂健康的窮漢，窮漢穿有一雙草鞋，哈里發認定窮漢的快樂和健康來自他的草鞋，於是用自己的靴子換了窮漢的草鞋。哈里發穿上草鞋，並下令全國軍民都如法仿效，以保國泰民安。他還將大量草鞋送給來訪的友好鄰邦，希望彼此能夠和睦相處。此後，草鞋開始成為這個國家的聖物，並被送進國家寺院裏供奉。國家從此歌舞昇平，百姓安居樂業，夫妻恩愛直至白髮千古。

追求童話式效果，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的一大特徵。政治強人通過某種神秘的政策修改，魔法般地使國家變了模樣。如今，一覺醒來，滿世界都是中國結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帶有今日慶典風格的唐裝，感覺上彷彿

到了一個古老的童話國度。與之相呼應的，則是哈利·波特 (Harry Potter) 的魔法學校剛剛開學。

一切都是那麼奇妙！

究竟是中國結被符咒化而成為國家象徵物，還是中國結就是符咒本身，將帶來某種神秘的國運變化？這至今依然令人費解。考察國家象徵符號在不同時代的變化，也許能從中找到蛛絲馬迹。

## 一 向日葵

向日葵是1960-70年代，也就是文革期間國家主義象徵體系中的核心象徵，近乎國家圖騰。

在傳統的中國文化體系中，向日葵並無特別之處。它不同於與人們日常物質生活密切相關的麥子、高粱之類植物果實有較高的實用價值；也不同於梅、蘭、菊、竹等觀賞類花草植物，這些是傳統知識份子文化精神的象徵，有着高度的文化象喻功能。儘管向日葵集花與果於一體，但它無論是食用功能還是觀賞功能均較弱；在



向日葵圖案組合

中國人的生活中，它是一種幾乎可以被忽略的植物。

向日葵能夠成為國家圖騰式的事物，這完全取決於其獨特的生物形態與國家意識形態之間的媾合關係。圓盤狀的花冠隨着太陽移動的軌迹而旋轉，始終朝向太陽。向日葵的這一生物性狀的意義在於，它首先暗示了太陽的存在，其存在價值指向外在的太陽，或者說，其本質由太陽這一外部事物所規定。

眾所周知，在文革期間，太陽有着特殊的政治含義，是國家最高政治領袖特有的象徵。政治領袖以「紅太陽」自居，廣大人民群眾則相當於地上萬物。紅太陽光芒普照，民眾因領承這一恩惠方得以生存。著名的革命「聖詠」《大海航行靠舵手》就唱出了這一情況。

出於對革命領袖崇拜的需要，向日葵很快就被高度符號化了，由一種用途不廣的普通作物昇華為國家圖騰符號。革命巫術使我們看見了一塊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葵花地，那裏盛開着各種各樣的葵花。這個民族的藝術智慧和創造精神都集中在這些千變萬化的葵花圖案上。

與此相匹配的是大量「忠」字符號。這一字符的結構及其功能與葵花圖案有着驚人的巧合。民眾的心臟外化為向日葵，永遠朝向領袖。

從使用頻率、字型變化及其功能方面看，「忠」字符號與傳統文化中的「福」、「壽」、「喜」等字符極為相似，而葵花圖案則接近於傳統文化中的蓮花、蝙蝠等文化象徵符號。由此可見文革時期的國家文化精神與傳統的民間法術文化之間的相似性。

在革命巫術的法力消失後，向日葵的神秘功能也隨即消失殆盡，復原為普通植物，為人民提供炒貨原料和食用油原料，在新世紀則進一步墮落為小資飾品。曾經作為革命對象的小資階層對向日葵之類植物的需要，與革命無關，其巫術功能也不那麼明顯。將風乾的向日葵（以及蘆葦、艾草之類）帶回室內，這更像是一個隱喻：來自野外而又被風乾了的植物，可以較為完好而持久地保存大自然的氣息。這一點暗示着這一階層人群的

各種「忠」字圖案變體





向日葵及忠字圖案與  
傳統的吉祥圖案(壽)  
之間的相似性

生活趣味——對大自然的親近，儘管它們只是大自然一個枯燥、乾癟的殘餘。

無論如何，向日葵的文化功能已然由國家精神的象徵符號，蛻變為民眾日常的精神消費品，這一轉變，正好暗合了整個時代的精神變化。

## 二 原子模型

1980年代國家主義的象徵符號是原子模型圖。原子模型顯然不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事物，它與現代科學有關，象徵着科學技術及與之相關的現代化理念。通過電子圍繞着原子核運行的軌迹圖，物質的內在結構昭然若揭。對物質本質的認知，是現代科學的最大夢想。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科學」(賽因斯、賽先生)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進入中國，最初只是啟蒙知識份子的文化符號，後來在中國經過了漫長的歷程，終於在1980年代充分國家主義化了，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理論支柱和價值來源。任何事物只要經科學驗證，便可獲得充分的合法性。而在特定的條件下，「反科學」可能會成為一種罪名。

文革後的1980年代，「科學」成為

國家主義的核心詞。科技知識在國家知識體系中擁有至高無上的霸權地位，被看作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科技理性在國家意識形態中的壓倒性地位，必然地引向科技崇拜。科學代替了傳統的儒學或毛思想，擁有了「國家宗教」的地位。當時確立的國家傳播媒體——中央電視台的徽標，就是將其英文名稱的縮寫巧妙地變形為一原子模型的圖案。科技進步的現代化理想，向公眾提出了強國富民的承諾。我們可以在1980年代的科普圖書和科幻文藝作品中，看到被誇張了的科技進步所帶來的未來世界景象。科技甚至被描述成一種法力無邊、近乎巫術的東西。



原子模型圖(左)，中國中央電視台徽標(右)。

由科技進步所刺激起來的烏托邦想像，甚至還有一個並不太遙遠的期限——2000年。經歷過80年代的人，應該還記得「2000年」這個詞彙所具有的神奇魅力，它幾乎就是古老的「天堂」、「黃金世界」以及「共產主義社會」的同義詞，但它又比這些名詞更實際、更具蠱惑性，因為它給人的感覺是具體的、可操作的。這個「具體

的烏托邦」的設計者並不只是給人們一個空洞的、對未來世界的承諾，而是同時提供了實踐的具體途徑和技術條件，那就是「科技進步」。而且在短時期內，公眾確實能夠迅速而又切實地感覺到科技給日常生活帶來的好處。公眾的信仰建立，往往需要可顯示的「奇迹」來支撐。

然而，對這個有限的「巫術」，人們很快就失去了興趣。公眾對科技「巫術」的好奇心也是有限的，「四化」理想的科幻小說的吸引力甚至不如懷古夢幻的武俠小說。

在知識份子那裏，原子模型圖所提示的關於現代性的想像，卻另有一番意義，即關於「人的主體性」的暗示。一如向日葵圖案，在原子模型圖中也有一個旋轉物——電子。電子圍繞着原子核旋轉，形成圓環狀圖案。但這種旋轉跟向日葵朝向外在於自身的太陽旋轉有所不同，它是事物內部結構中的自我運動，內在地揭示了宏觀世界的運動規則。原子模型的圖案是自足的、自我論證和自我完成的，暗示着事物自足的內在世界——一個小宇宙。

根據現代科技理性所揭示的物質運動規律，物質自身的自主運動被賦予了某種主體性的功能。這一點乃是1980年代知識界的主體性哲學的邏輯前提，主體性哲學則是科學理性主義的哲學形態。這種建立在科學理性前提下的主體性哲學，使得8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找到了一個共同認同的精神價值體系。在意識形態意義上，主體性哲學與共產黨官方哲學之間有着尖銳衝突，80年代以來屢次的思想整肅行動均與此有關。但在認識論和邏輯學意義上，二者卻有一些根本性的一致。

以科學這一相對抽象的知識體系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核心，得到了以知識為安身立命之本的知識份子的認同，但很難成為民間和公眾的集體無意識符號。很少人會將此抽象的形式像供奉向日葵那樣布置在居室裏，它只能是在公共場合中的一個國家圖騰。

儘管科學符號在國家意識形態體系中被視為具有鎮邪功能的「法器」，但在公眾日常生活中，原子模型所代表的科技理性尚缺乏足夠法力來鎮祛非理性的邪魔蠱惑；它不斷遭到民間傳統巫術的衝擊。如果說，文革的迷信和狂熱是一種國家主義化了的精神巫術的話，那麼，在文革後期這種精神巫術的國家性被消解之後，人們所固有的宗教情緒則以民間巫術的方式得以宣泄。民間傳統的巫術迷狂，以歇斯底里間歇性發作的方式，不斷挑戰國家科技理性。大到半宗教色彩的各類氣功，小到商品傳銷，無不表現出其巫術色彩。

### 三 中國結

在整個1990年代，國家意識形態始終沒有找到恰如其分的象徵物，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90年代國家意識形態的混亂和無特徵狀態的表徵。直到中國結出現，這一難題才得到初步的解決。至於這樣一種繩結是如何由民間工藝演變成國家節日慶典場合的裝飾物，則尚難闡明。但有一點卻很清楚：國家意識形態所要徵用的，是中國結對「連結」的暗示及其有關「吉祥」的象徵性。與此相關的還有一些附加物：唐裝和各種中式服飾，以及大紅燈籠等。這些相關事物系列



中國結

共同構成了新的國家主義象徵體系中的重要部分。

用一根紅色繩子編結而成的環狀繩結圖案，多為菱形，有形狀多樣的變體。這個來自民間傳統的結繩工藝，有可能是中國古代民間文化中的卍字符號的變體，象徵着福祉、吉祥和如意。繩子可以用來記事，也可以用來縛人，而它盤結起來，卻變成了迷人的結，讓人們遺忘了它本有的其他功能。

中國結的另一意義在於，國家意識形態認同了民間對吉祥、喜慶的世俗要求。文革期間，這種民間習俗可能因為其與封建文化之間的聯繫而被禁止；在80年代，則可能因為其與現代科學精神無關而不被提倡。現在，國家意識形態體系不僅認可了這一民間習俗，而且進一步徵用它為國家節日慶典場合的吉祥物。

中國結的迷宮式結構和糾結、變化、令人迷惑的風格，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東方古老文化的神秘主義特徵，其喜慶吉祥的象徵意義，則包含着民間文化中的巫術理念。國家意識形態對古老的民間巫術的挪用，也可看作人們有關「國運」方面的焦慮。

找到中國結來作為國家主義文化的象徵物，這一迹象表明，國家意識形態終於逐步放棄了帶有強制性的、刻意製造出來的文化理念（如向日葵

所象徵的宗教理念），也部分地放棄了抽象的、堅硬的、非人性化的科技文化理念，轉而開始向世俗的民間傳統文化尋找其合法性的基礎。國家意識形態正在更新，古老的民間傳統文化正在國家主義化。這也可以看作是國家意識形態徵用民間文化和傳統文化的努力已經獲得了成功。民間與官方終於在「民族—國家」語境中達成和解，這兩種壁壘分明的意識形態終於找到了互相認同的可靠中介物，從此開始歡渡它們企盼已久的蜜月。

不過，這種國家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基礎僅僅是象徵性的，它停留在精神安慰和心理暗示的水平上，滿足國民的節慶心理（對喜慶和吉祥的心理需求）。它只是一種吉祥物，一種節日飾品，可以用來裝點一下日常生活的貧困和灰色，實際上與公民社會的公共制度和日常生活無關。

值得關注的是，以文化上的民族主義來整合業已崩潰的國家理性，顯然刺激了中國人根深柢固的大國夢想和文化帝國主義心理。並且，這一夢想不僅是屬於中國大陸的，它同時也能夠得到整個華人世界的普遍認同。在此之前，「東亞儒家文化圈」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騰飛和文化復興為這一夢想提供了強有力的刺激源。在資本與

春節期間，民眾踴躍購買中國結。



權力的雙重誘惑下，「新儒家」的文化夢想正在變成新國家主義的政治實踐。

毫無疑問，中國結所代表的「民族—國家」理性，顯然比向日葵所代表的政治理性和原子模型所代表的科技理性，具有更為深厚的民族文化淵源和更為廣泛的認同基礎。民族主義為國家意識形態打下新的強心針，新國家主義意識形態藉此謀求自身合法性的依據。

#### 四 國家主義美學符號

三種不同種屬的象徵物，分別象徵着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三個不同階段：國家主義的神話階段、國家主義的巫術階段、國家主義的節慶階段。由狂熱的神話祭祀儀式，到講究實際功效的、帶有巫術色彩的技術崇拜，到討吉利、誇張喜慶的節日慶典狂歡，或者說，由神秘悲劇，到理性正劇，到荒誕喜劇，國家主義意識形態魔術般地完成了它的「三級跳」。

至此，問題並沒有結束。我更感興趣的是：上述三種文化符號在形態和傳播過程中的相關性。這些文化符號在美學生產上的特徵和含義，比它們所指涉的象徵意義更為重要。這些不同時代和不同意義的象徵物，在美學形態和傳播方式上，表現出令人驚訝的相似性。

帝國意識形態高度成熟，而其美學形態則嚴重衰老、僵化。由此可見，國家主義在美學上的惰性更大。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可以改變其精神內容及其相應的象徵物，但很難改變其美學形態。一種呆板的、千篇一律的美學結構和工藝，根深柢固地盤踞在國家的無意識結構中，構成了國家主

義的文化和美學「本能」，支配着國家主義的想像。這一點，顯示出了國家主義在美學上的低能，進而也是文化想像力的貧乏和美學造型能力的萎縮。美學無能是國家主義的精神疾病最典型的症狀。

這一美學症狀，使國家主義意識形態變得有點滑稽。重複，是喜劇性的基本要素之一。從幾種象徵物的形狀構成可以看出，國家美學造型工藝就像是患上了「強迫症」，不斷重複着單一、刻板的行為，彷彿馬戲團的小丑，不斷表演單一的動作引人發笑。然而，無論表演甚麼故事，劇情也可以改變，但其紅鼻子和花格外衣卻一如既往。憑着這一鮮明的性格和身份標誌，人們得以輕易識別出其小丑身份。同樣，儘管文化象徵物歷經三變，其大同小異的美學形態卻暴露出國家主義文化精神的真實面目。

更為有力的佐證是，國家電視台批量生產的、表現宮廷生活和帝王形象的歷史劇。帝王一改其流氓兼屠夫的嘴臉，扮演起正劇英雄或喜劇小丑來。而這些作品恰好迎合了官方與民眾共同的美學嗜好。

節慶盛典的喜慶氛圍，裝點着新世紀的文化，民族文化精神以一種喜劇的方式得以還魂。民族文化復興看上去更像是一幕過份誇張的滑稽戲。在此狂歡式文化語境下，中國結不可避免地成了文化慶典儀式中一個至關重要的道具。

**張 閱** 1981年畢業於江西省九江醫專。1995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任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文學評論集《內部的風景》。